迈向间性特质的建构之旅

——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位移及其启示

王一川

摘要：中文学科的当前地位，需要从其在改革开放40年国家学科制度中的学科位移轨迹来看。中文学科在此40年间发生了如下四层面学科位移：一是学科门类间的学科位移，从核心学科门类退居边缘学科门类；二是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从引领学科变成平行学科；三是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历经整合、细分和开放时段；四是文艺学二级学科下三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从先锋学科变成常态学科。中文学科其实并未真正退居学科边缘，而是积极融入各学科门类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呈现出活跃的间性特质。这种间性特质可以理解为中介性、融合性和导引性。中文学科应发掘和建构自身的以文学性、诗性或语言艺术性为鲜明特征的间性特质，令其融入当代各门学科发展过程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成为其中的创造性元素或想象力之泉眼。

关键词：中文学科；学科位移；学科制度；间性特质

 作者：王一川，1959年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下简称中文学科）的学科地位到底怎么了？这是近年来学科同行间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这个话题其实包含若干相关的思考：一是中文学科确实退居边缘了吗？二是导致其边缘化的原因是什么？三是它在当代条件下应当有怎样的学科地位？要回答这样问题，不宜仅仅就它的当前处境来看，而应当适当扩大范围，从改革开放40年这一大跨度中中文学科在整个国家学科制度中的学科位移轨迹来看。因为，正是在中国社会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40年间，中文学科的地位与国家学科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紧密相连，特别是与中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始终紧密交融，并在这一进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学科位移。学科位移，在这里是指一门学科在整个国家学科制度中的地位发生移动的过程。从如今这个“不惑之年”视角去回望中文学科的来路，难免产生一些回味。对它的位移情状可能当时亲历过，但由于后来已渐渐习以为常，就容易变得印象模糊了。借助这个40载时间节点去回忆一番，或许可以重新发掘或加深某些记忆。每个亲历者的视角毕竟有所不同，所以我的回忆难免带有个人局限，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同时，我的回忆尝试从大到小地逐渐在四个层面上展开，依次考察中文学科发生的在学科制度中的学科门类间位移、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间位移、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间位移，以及最后，文艺学二级学科下三级学科间位移。这四个层面的学科位移其实是相互交融而难以真正分开的，这种分开不过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已。

 一、核心与边缘

从我国现行学科制度的宏观视角回看，中文学科在这40年里确实无奈地品尝到从往昔的核心学科门类而退居边缘学科门类的痛苦滋味。尽管我个人以为这种痛苦感受大可不必，但在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些成员心中，或许却是一种不愿接受的残酷现实。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代，乃至更早的“十七年”时期，中文学科同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一道，总是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成为不折不扣的核心学科之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尽管以今天眼光看当时的学科制度并不健全），中文学科及其所从属于其中的文学门类一道，在当时的国家学科门类之间扮演了核心学科门类之一的角色。那是因为，当时国家社会生活的中心是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中心是革命，准确点说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总是需要获得来自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等的有力的学术支撑，于是频频求助于中文学科以及文学门类中的其他学科如外国文学学科，正像同时求助于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门类一样。在那个特殊时节，一部学术著作还一篇论文一经出版或发表，很有可能就会立即起到“经国之大业”的巨大作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的在今天看未必就能被列为“不朽之盛事”）。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开了如今蔚为大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先河，实际上为中国新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合法化确证的重要作用。秦兆阳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认为在坚持追求来自生活的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做时代划分，从而对当时文艺政策下出现的教条主义偏向提出质疑和反思，立即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尽管“反右”时被批判为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再如钱谷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上海文学》1957年第5期）、严家炎的论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等也都在当时文艺界发生过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全国层面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推进。在“文革”后期的70年代，当社会生活的中心被规定为“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一些由国家层面发动的政治革命运动接连涌现，如“兴无灭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这样的革命意识形态必然向中文学科提出来自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等中文学科的更加直接和强烈的支持[[1]](#footnote-1)。正是由于来自国家层面的革命政治的特定需要，中文学科似乎已经攀升到百年来该学科所能攀升到的最高位置了，成为当时中国学科之林中的核心学科或统领学科之一。当然，实际上，“文革”时期的中文学科发展总是被要求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不可能按照其自身的学科逻辑去生长和发育。

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宣告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变为“经济建设”。正是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知识分子等发挥其主导作用，这就导致学科制度和相应的教育制度等得以恢复重建，例如，1977年起陆续恢复高考和恢复学位制度等。诚然，“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实施，必然会最终导致分别突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学科制度中的基础学科地位和核心学科地位，但毕竟在那个“拨乱反正”和“思想启蒙”的特殊年代，也就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大约10年间（1979至1989），中文学科的地位同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门类一道，仍然一度继续保持着核心学科门类的地位，至少能够与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门类不相上下。这是由于，“拨乱反正”和“思想启蒙”都需要继续借助于中文学科的力量，通过对其时给予普通公众以强大影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当代文艺思潮的及时批评和研究，以及对其中牵涉的诸多文学基本观念和文学史问题的纵深分析，协助知识界和普通公众迅速调整其社会心态，义无反顾地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时代相诀别，转身迈向崭新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只要稍微提及如下几件事就清楚了：一是何其芳遗作《毛泽东之歌》在1977年第10期《人民文学》发表，率先披露了毛泽东生前有关“共同美”的个别谈话，迅即点燃了一度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二是毛泽东生前致信陈毅有关“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的观点发表，立即引发了有关艺术思维、艺术形象及艺术规律等文艺观念的广泛讨论；三是复旦大学本科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开启了影响广泛的“伤痕文学”的创作与评论热潮；四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把数学家陈景润塑造为改革开放时代急需的科技英雄偶像，及时地搅动了全国的科学热，成功地和富于魅力地配合了国家有关尊重知识分子和尊重科学的战略的实施。如果说，前两件事主要发生在中文学科中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同时又辐射到中文学科领域之外，那么，后两件事则主要由中文学科中的文艺批评界及文学史界发动和参与，同样产生了向外辐射的巨大作用。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自觉承担起国家改革开放时代精神转换器的特殊作用，中文学科借助那时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的力量并且与之携手并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学科制度中扮演了核心学科才有的特定作用。

直到1980年代初诗坛出现的“三个崛起”论[[2]](#footnote-2)，中文学科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界的引领地位以及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中的核心地位，似乎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和牢不可破的。谢冕冷静地分析了当时诗歌界遭遇的分歧和面临的挑战：“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对此，他以捍卫艺术真理的勇气提出自己的开放的应战建议：“接受挑战吧, 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 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 有风, 有浪, 有骚动, 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 适当容忍和宽宏, 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3]](#footnote-3)如果说谢冕的文章把“朦胧诗”视为“新的崛起”的美学力量而应当加以欢迎的话，那么，稍后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则进一步地把“朦胧诗”的美学成就抬举到创造了不同于过去美学原则的“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4]](#footnote-4)，这就把争鸣事态推向了更加激烈的地步，引发了相反力量的激烈反驳。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则相当激进地宣布中国诗歌应该告别“现实主义”而走向“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诗中的现实主义界限是最模糊的”,现实主义的存在“值得重新考虑”,“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人类艺术创作方法的天涯海角！现实主义不可能作为目前文艺创作的唯一原则”，因此要把现实主义的旗帜降下来,升起来一面新旗——“现代主义”。[[5]](#footnote-5)这样做随即引发了尖锐的批评。除了这类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激烈争鸣外，当时还出现过几大热潮，如美学热、红学热和鲁学热等，以及横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人道主义”之争。在此过程中，作为思想史家和美学家的李泽厚则被尊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文艺界人物，甚至受到一些青年学人的“明星”般拥戴。

但进入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的持续实施，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发展和壮大。过去的革命战略更多依赖于人文学科的统领地位和作用，而今则是自然科学门类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学科门类，以及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门类迅速发展成为核心学科门类。当经济学家群体如孙冶方、薛暮桥、厉以宁、吴敬琏等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声誉与日俱增时，李泽厚作为美学家在文艺界和其他各界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日趋缩减。相应地，随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的火热阅读效应和其主人公陈景润被尊为新的国民偶像，以数学热为龙头的科学热风起云涌，“学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时代强音，而在此热潮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文学，则不过是成为科学热中的寂寞而又不甘的铺路石而已。

正是在自然科学门类和社会科学门类分别跃升为学科制度中的基础学科门类和核心学科门类时，中文学科及其所从属于其中的文学学科门类却日益退居边缘学科门类行列。进入90年代以来，当自然科学门类的基础学科门类作用和社会科学门类的核心学科门类作用愈益突出、并且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时，中文学科则日渐远离现实文化与学术制度的核心区域而退入相对狭小和相对纯粹的学术专业圈子里。90年代初出现的“人文精神”讨论、学术史热、审美文化热及大众文化论争等正是例证，有力地呈现出中文学科及其所从属于其中的文学学科门类业已转化成为少数专业圈内人士的话语游戏这一特定事实。应当讲，其论争的热闹程度仍在，但却更多地只限于专业圈子中的少数专业人士之中了，对圈外的社会各界影响甚微，迥然不同于80年代了。

 二、引领与平行

在不无痛苦地确认了中文学科及文学学科门类在全国学科制度中的边缘境遇后，再来看这个学科在文学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间的学科地位的位移过程，或许痛苦又进一步加深了。可以确认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作为一级学科的中文学科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往昔核心学科地位，变成了与该门类内其他一级学科相并立的平行性学科，这些平行性学科就是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和新闻传播学。不仅如此，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宣布设立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时，中文学科就不得不放任曾经从属于自己的艺术学出去独立门户了。这一学科位移的时代背景在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进程的持续推进，以电影、电视艺术和流行音乐等大众艺术为代表的各艺术门类日趋活跃和繁荣，它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愈益突出，直到看起来似乎远远盖过文学的风头。特别是电影、电视艺术和流行音乐等大众艺术门类的社会影响力有时呈现出压倒性优势，这只要提提张艺谋、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等演艺“明星”的社会效应就够了。正是各艺术门类的日甚一日的社会风光，为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独立出来、升级为单独的学科门类，提供了丰厚的原动力和学科合法性基础。

这样一来，中文学科怎么办？表面看，它最初与作为一级学科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道，联合组成文学学科门类，从而确证了自身在文学学科门类中的“老大”之一地位。随后，变化逐渐出现：文学学科门类接纳了新兴的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中的第三个成员，再后来接纳更新和更加热门的新闻传播学为第四个一级学科成员。这样一来，中文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文学门类中的资深学科，就与这两个新兴的相邻一级学科组合起来，在文学学科门类中呈现出四个一级学科相互平行相处的状况。不过，更新的变化到2011年终于发生：中文学科不得不听任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分离出去，变成了新的独立学科门类，导致文学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数量减少到三个。如此一来，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中文学科与文学学科门类整体的一道已然趋于衰微。

其实并不尽然。当艺术学脱离文学门类而独立发展、取得了与中文学科平行发展的地位，这一事实可以反过来促使中文学科进入新的自我反思或自反过程，尝试放弃过去的试图统领所有艺术学科门类的过于高远的志向，重新回到语言艺术学科这一核心点，再度积聚起自身的内生外用的强大力量。与各门艺术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中文学科的学者们与过去开口就是“文艺”并提、或以“文”带“艺”甚至以“文”代“艺”不同，如今越来越多地专提“文学”而越来越少地“文艺”并提了。这就代表了一种新的双重自觉姿态的发生：作为语言艺术在艺术门类整体中的艺术门类特性自觉、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学科而在与艺术门类相关的多种学科中的中文学科特性自觉。文学这门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及其与各门艺术的平行关系、以及中文学科与各艺术门类学科之间的平行关系，都值得借此机遇加以重新衡量。

 三、整合、细分和开放

再进入中文学科内部，其一级学科和其下属的各二级学科之间也历经地位变迁或位移：从改革开放初期学科整合、到90年代学科细分，再到当前跨学科开放大约三阶段转变过程。与40年来国家学科制度建设与变化的节奏相应，中文学科历经的三阶段大致如下：首先是80年代的与文史哲等相邻学科的整合发展态势，那时的这些相关学科语言颇为近似而未予明确区分；其次是90年代逐步呈现学科细分，各自愈益专业化和专门化，例如划分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最后是21世纪以来至今寻求跨学科整合，原本相互细分的各学科之间又需要通过重新聚合而产生一种合力。

从90年代起确认的现有学科目录看，中文学科内部已经有了如下八个二级学科的明确划分：050101文艺学、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3汉语言文字学、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050105中国古代文学、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进一步看，二级学科下面还可以设立三级学科。例如，文艺学下面就往往有文学理论或文学基础理论、文艺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美学等三级学科（各学科机构可以自主取不同名称）。这种学科细分的初衷是寻求和实现学科发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确实对我国学科制度和学位制度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这样说的可与之比较的关键参照系，就在于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中文学科境遇。如前所述，相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和“文革”浩劫中中文学科所处的直接从属于国家政治的特定境遇而言，80年代中文学科制度的恢复和90年代以来它的专业化及规范化建设，毕竟都代表了一种进步趋势——及时地顺应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的总节律，并成为这些发展的动力之一。对这一点务必有清醒的历史意识。

不过，学科制度毕竟是要适应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总体需要，因而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固定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中文学科内部的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实际上常常处于相互交融和整合的态势中，并且还进一步向文学门类外的其他人文学科（例如历史学和哲学等）和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开放，有时甚至向自然科学开放。其重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和复杂的相互交融趋势，这就对中文学科内部和外部的交融提出了新要求，迫使它做出改变，也就是走出过去的学科细分状况而寻求开放；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文学科的有力参照系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80年代以来不再满足于画地为牢、坐井观天的封闭境遇，而是日趋开放和交融，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风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消费文化研究、少数族裔研究等，无一不是竭力探索和运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

四、先锋与常态

就我个人曾经多年参与其中的二级学科文艺学而言，它已经从当年的先锋学科演变为如今的常态学科了（或许更有人进一步把它描述为中文学科中的边缘学科）。遥想80年代，在面对“文艺为政治服务”、“阶级美”与“共同美”的关系、文艺与审美、文艺的本质、“典型”与“意境”等若干重大文艺问题上，文艺学学科曾经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等文艺浪潮一道，义无反顾地起到了中文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先锋的重要作用，一批批文艺学者在文艺界的旧堡垒里左冲右突，勇于突破禁区而开辟出文艺研究新观念、新方法或新视角的一片片绿洲，与众多学科学者一道，将中文学科引向了学科开放地带。例如，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学科倡议和“艺术形象”论、童庆炳的“文学特征”论和“立交桥”论等，有力地伸张了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要性。笔者自己作为当时的年轻后学，也曾经从“审美体验”“体验美学”“人类学文艺学”等角度去对上述探讨做出过自己的响应。

但是，随着开放时代的纵深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变化逐渐出现了：一是起初在封闭条件下视为珍贵的外来理论或先锋理论，在开放条件下业已变得平常或不再先锋了。例如，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推进，人们早已把审美是文艺的核心本质不再视为先锋理论而是视为一种路人皆知的常理了。再有就是汉译学术著作的大量发行，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使得外来理论逐渐被各方接受而不再需要等待文艺学界的中介了，更不需要文艺学者们的普罗米修斯式冲破禁区之义举了。二是中文学科下各二级学科业已建立起各自独立的学科领域和规范的事实，就客观上使得文艺学起初的可以辐射或引领其他二级学科的先锋地位已不复存在。三是原来受到文艺学影响乃至引领的艺术学，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研究各艺术门类的普遍规律的独立的一级学科领域——艺术学理论，并且与社会影响力愈益凸显的各艺术门类一道不断拓展自身的影响力。这样，大约从90年代开始，文艺学就从中文学科中具有某种先锋作用的学科，逐渐变成了与其他二级学科平行的常态学科了。甚至，中文学科下其他二级学科有时还对文艺学学科展开尖刻的质疑，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学科优越感。其部分理由是，文艺学想研究文学的普遍规律，这能找出来吗？找出文学普遍性来真的在当代有用吗？或许文艺学什么都想研究，但最终什么也都精通不了，如此之类。

五、启示：迈向间性特质的建构

如何看待当今中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即便是在做过上述简要梳理后，这也可能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和见仁见智的开放性问题。对此我只能谈谈个人一孔之见。可以说，中文学科同它的研究对象——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道，在现有学科之林中日渐呈现出一种新型特质：间性。

这种间性特质是说，正像文学已日渐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和领域，成为其所赖以融合或粘合的融合剂一样，中文学科正起着重新向各门学科的深处渗透或交融的突出作用。这就是说，中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仅仅从中文学科自身去加以固化，而是需要放到一种更加宽阔的学科之间地带去重新审视。中文学科中总是回荡着一种对蕴藉在语言艺术及其所创造的形象世界中的真理性加以探寻和喜爱的热忱。因为，文学作为艺术家族中的一员，其独特特长在于通过语言艺术而创造出在艺术形象世界中建构的活生生的和可以不断衍生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6]](#footnote-6)文学中的语言可以形塑出与人的思想直接对应的现实感的世界，而这一特点给文学自身带来了其他艺术所无法企及或比拟的独特的精神丰富性和深刻度。马克思之所以高度推崇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并且在他自己的《资本论》通篇燃烧着旺盛的诗性激情，正是由于他自觉听从语言艺术在学术研究和个体人生中的引领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诗由于运用语言去表达理念，同造型艺术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几乎就是让已被心灵化了理念自身获得直接显现，所以其艺术表现的层级更高乃至最高。“诗，语言的艺术，是第三种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7]](#footnote-7)作为综合造型艺术和音乐的特长并同时克服它们各自的短处而形成的更高艺术门类，“诗不仅在更丰富的程度上能把主体的内心生活以及客观存在的特殊细节都统摄于内心生活的形式，而且能把广泛的个别细节和偶然属性都分别铺陈出来。”由于上述特长，“作为语言的艺术，诗既能像音乐那样表现主体的内心生活，又能表现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所以诗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峰，是抽象普遍性和具体形象的统一。”[[8]](#footnote-8)且不论黑格尔的“诗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的论断在当前是否会引发来自各个艺术门类专家的质疑，单说他对诗的独特特长的发掘本身，确实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诗运用语言艺术方式去刻画主体内心世界和客观现象世界，可以直指人类心灵，呈现人类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度。固然，文学不能像绘画那样呈现出感性直观性，也不能像音乐那样展示精神丰富性，但却可以将两者的特长综合为一体。这一综合性特长在今天仍然是其他各个艺术门类所无可替代的，甚至就是其他各个艺术门类都需要加以充实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元素。不仅各个艺术门类，而且扩展地看，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部门，都需要来自文学的综合特长的充实。由于如此，文学的间性特质就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了。可以说，国家文化战略、国民文化生活、其他各个学科门类的学科基础或想象力源泉等，都能够从文学学科门类特别是中文学科中获得充实和完善。当然，与此同时，文学学科门类以及中文学科本身也需要同时从其他各个学科门类中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养分。

中文学科的这种间性特质的呈现，是依托其丰厚的本土传统和当代现实基础的。首先，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及学术发展历程可见，“文”总是高于“艺”并导引“艺”，由诗文所构成的“文”总是在文化及学术中起到引领作用。如今，这种古典传统虽然暂时受到了挑战，但“文”的导引作用却不会轻易退场，而只是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新变化：从过去的“显秀”地位，即明显的引领学科地位，变成了如今的“隐秀”地位，即隐蔽地起融合作用的学科地位。这样的变化正是文学的间性传统的一种当代呈现。这样的新地位和作用其实更加务实、牢靠和稳定。

其次，当代社会生活中网络文学的发达和活跃，及其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巨大的原创性感召，突出地表明，文学并未在当代生活中退居边缘，而是更加特殊地融入其他各门艺术中、乃至公众日常生活中，有力地显示其间性特质。网上人气小说《盗墓笔记》《鬼吹灯》继网上风行之后不仅变成畅销的纸质书，而且又相继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等其他艺术门类作品，对公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作家莫言、刘慈欣和曹文轩先后于2012、2015和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雨果奖和安徒生奖，随即在公众中掀起了新的中国文学热潮。这充分地表明，文学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其实并不低，它在各个艺术门类的挤压下仍旧渴望保持自身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公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对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间性要求。从学者层面看，中文学科学者的间性作用愈益突出。近年来，一批中文学科学者活跃在大众传媒领域，例如电视荧屏、畅销读物、文化休闲等领域。去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引人瞩目，其中几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十分活跃，就是一个例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社会文化生活迫切需要中文学科的日益广泛的参与和间性作用。

再次，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国家文化战略，实际上对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间性要求。国家层面的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等倡导，旨在提升公民的文化自信。而公民的中国语言文学素养的提升，无疑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当然基础。这必然要求中文学科在其间发挥更加突出的融合性作用，即间性作用。

最后，直到当代，各学科门类的有识之士仍然注重从中文学科中吸纳必需的间性养分。钱穆高度重视中国史及中国文化中蕴藏的诗性及艺术性特质：“吾尝谓中国史乃如一首诗，余又谓中国传统文化，乃一最富艺术性之文化。故中国人之理想人品，必求其诗味艺术味。”[[9]](#footnote-9)这位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直接把“史”视为“诗”，悉心探求中国史之诗味或艺术味，相当于指认历史学在其根底里或实质上就是诗学或艺术学。这一认识的基础，正是相信文学具有融入其他文化形态中的间性特质。刚刚去世的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曾经以开放的胸怀将文学与语言学学科成果融化于历史学科中，以自己构建的比喻理论去分析历史文本，揭示了历史学回归于诗学的新路径，从而主导 20 世纪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论转向。“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现今处境不佳，因为，它已看不见它在文学想象中的起源。为了看似科学的和客观的，它已经压抑并剥夺了其自身力量与更新的最大源泉。通过再一次将史学与其文学基础更为紧密地关联起来，我们不但能防止意识形态的扭曲，也将创造一种历史‘理论’，没有这种理论，历史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10]](#footnote-10)他将历史学带入诗学或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史学中实施诗学引领下的间性特质开放的卓越典范。

从以上来自历史学学者的文学学科认同这一点，可以获得宝贵的启示。中文学科应当积极地和坚定地发掘和建构自身的以文学性、诗性或语言艺术性为鲜明特征的间性特质，令其融入当代各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成为其中的创造性元素或想象力之泉眼。到此，我想还可以进而对中文学科的间性特质做点必要的初浅理解。第一，它意味着中文学科（与文学一道）具有居间的中介性。由于是专门研究汉语言艺术的学科，它不会固守于一个封闭区域，而是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对汉语言艺术拥有天然信仰的各门学科和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起到一种中介或传感器作用。每当各门学科和各种文化形态感到有必要重新叩问我们的母语的微妙而又重要之层面时，必然会求助于中文学科。可以说，哪里有汉语言艺术的踪迹，那里就会有中文学科的作用场。第二，它表明中文学科具有融合性。也正是由于具有中介性，中文学科可以在各门学科和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起到融合或粘合的作用，将面临分离命运的它们在语言艺术的作用场中重新凝聚为新的充满生气的完整体。第三，它显示中文学科有着导引性。由于语言艺术尤其擅长于捕捉社会生活过程中蕴藏的未来意象的闪光，引导人们及时感知对当前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生未来远景，故中文学科可以促进或配合各门学科和各种文化形态，真切地体验和敏锐地把握未来意象，并用它照耀当前现实境遇和对过去的回忆。上述三方面还不过是呈现了间性特质的概要而已，至少已由此可知，中文学科在当前的优势依然得天独厚，无可取代。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学科自信。

结语

中文学科看起来已不再位居国家学科制度中的核心学科区域了，也就是不再成为风光无限的学科门类或学科了。但这并不真正要紧。它却可以“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各个学科之中和存在于它们之间，在各学科之间发挥自己的特殊的间性作用。中文学科当然需要继续坚守自身的独立规范和品格，但确认和开放这种间性特质也有其必要性，这有助于自身尽力释放其在学科之林之间的中介性、融合性及导引性潜能。想必，谁也不愿意再重返70年代时那种无以复加的中文学科的所谓风光地带了。迈上“新时代”之新旅程的中文学科，与其继续缠绕于核心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之论争，不如气定神闲地和甘于寂寞地建构自己的如水流般柔性而又独具渗透力和建构力的间性特质。关于水的这种柔性品格，不妨来温习《老子》第八章的如下描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最高的品格就应当像水一样，具备柔和而宽厚的品格，甘居卑下之位，淡泊宁静，善于滋养万物，而同时却又不争功德，从无怨咎。[[11]](#footnote-11)这样的“上善若水”品格，仿佛就针对当今中文学科的间性特质而提供了一种启示。苏轼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2]](#footnote-12)中文学科的间性特质，恰似这自由流淌的柔性之水，不存在恒定不变的铁规，也无论遭遇何种迂回曲折，总是率性而为，常行常止，随物赋形，滋养万物，不断释放自身的创造性品质，成为各种文化形态中永远充满灵性而又从不争功的引领性品质或核心力量之一。

（原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1. 极端的畸形例子就是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实际上相当于借助文艺评论而揭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后来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政治批判定下基调。但这种文艺评论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文学科发展的正常实例。 [↑](#footnote-ref-1)
2. “三个崛起”论是指1980至1983年间围绕“朦胧诗”的评价而发表的引发争鸣的三篇同样题为“崛起”的文章，它们是：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围绕这三篇文章而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文艺创作美学原则的论争，在当时文艺界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footnote-ref-2)
3.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footnote-ref-3)
4.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 [↑](#footnote-ref-4)
5.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footnote-ref-5)
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footnote-ref-6)
7.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三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footnote-ref-7)
8.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第三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footnote-ref-8)
9. 钱穆：《品与味》，《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0页。 [↑](#footnote-ref-9)
10.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footnote-ref-10)
11. 有关理解及阐发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其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92页。 [↑](#footnote-ref-11)
12. 苏轼：《文说》，据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footnote-ref-12)